

DOI: 10.16750/j.adge.2024.04.008

# “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困境与预防

包水梅 陈志华

**摘要:** 认为当前我国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落实“国优计划”面临系列挑战, 如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内源性动力不足、教师教育基础薄弱、组织运行机制不健全、培养模式有待创新、“乐教适教”优质生源甄选困难等。提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转变价值观念, 承担基础教育高水平师资培养的重要使命; 调整教育学院定位, 组建精良的教师教育师资队伍; 建立协同组织机制, 充分发挥“国优计划”各参与主体作用; 创新培养模式, 助力“国优计划”实现科学家型教师的培养目标; 建立全过程质量保障体系, 促使毕业生乐教、适教、胜教。

**关键词:** 国优计划; 研究生教育; 教师教育;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培养模式; 科学家型教师

**作者简介:** 包水梅,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学者,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兰州 730000; 陈志华,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兰州 730000。

2023年7月, 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国优计划”), 首批30所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试点开展研究生层次教师教育, 从国家层面对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做出制度性安排, 体现了我国关于高质量教师培养的国家意志。理论上,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较传统师范院校而言, 具有学科门类齐全、专业覆盖面广、学术水平较高和学术资源丰富等多方面优势<sup>[1]</sup>, 但囿于教师教育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长期缺失, 此类可能优势能否在教师教育实践中转化为现实优势尚未可知。为推进“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政策的落实与高质量发展, 当前亟须明确“国优计划”政策推行的背景意义, 厘清其可能面临的困境, 为有效落实“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提供路径建议, 进而扎实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与人才强国建设。

## 一、“国优计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建设教育强国, 基点在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 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sup>[2]</sup>。而高水平教师队伍是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当前我

国基础教育教师存在学历层次不够、知识结构单一和发展能力有限等问题, 已成为影响教育强国建设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瓶颈<sup>[3]</sup>。在此背景下, “国优计划”政策的出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培育高水平创新型师资, 承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任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时代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之需, “国优计划”是培养高水平创新型师资, 进而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重要手段。近年来, 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 教育部相继出台多项人才培养政策, 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然而, 时至今日, 拔尖创新人才仍存在较大缺口, 关键的“卡脖子”问题仍亟待解决。造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系统性的断裂。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在中小学阶段是激发、养成拔尖创新人才创新素养与创新潜质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的教育应努力营造科学研究氛围, 提高学生对基础学科的认识与兴趣, 为大学阶段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做好人才储备。然而,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存在一定程度的思维僵化与学习功利倾向, 缺少探究前沿科学问题的敏感性与主动性。为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提升路径研究”(编号: BIA230202)

活跃学生创新氛围,夯实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须建立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贯通育人机制<sup>[4]</sup>。因此,如何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质、涵育学生的创新精神与能力便成为中小学参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首要课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支具有创新能力与素养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国优计划”中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对高层次、创新型师资的培养正是对该需求的回应。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因其学科综合优势,所培养的“国优计划”研究生既有长期快速接触本学科学术前沿的便利条件,具备一定的创新素养,又掌握教育基本方法与规律,能更好地在中小学创设科学研究氛围,引导中小学生学习养成关注科学、主动创新的品质。正如文东茅教授所言,“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在于“培养出一批既懂得科学研究规律又有深厚教育情怀和扎实教学能力的高水平科学类教师”,进而“承担培养真正拔尖创新人才和未来科学家的重任”<sup>[5]</sup>,达到以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更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的目的。

## 2. 培育科学教育教师,切实推进科教兴国战略

培育一批高水平的科学教育教师,在中小学阶段着力加强科学教育,进而培养一批未来的科学家与研究者,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与人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切实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教师的质量与学生学习的质量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基础教育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sup>[6]</sup>。然而,我国科学教育发展较为缓慢,高水平科学教师非常短缺,有研究指出,我国合格的“跨学科整合”专业化的STEM教师占比不足5%<sup>[7]</sup>。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反复强调要培养一批优秀的中小学科学教师,“国优计划”政策也强调要“重点为中小学培养一批研究生层次高素质科学类课程教师”。同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反复强调的研究性学习客观上也对教师提出了“研究型”要求。研究性学习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探究性和创新性,要求教师具备跨学科知识和研究能力,以便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思辨和探究,培育学生的科学思维。科学教育在科教兴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中小学科学教育对“研究型”教师的需求等,共同影响、促使国家启动“国优计划”,以培养具备综合科学素养与科学研究能力的中小学科学教师。一方面,“国优计划”试点高校除几所师

范大学外,其余几乎均为理工学科见长的顶尖名校,能帮助研究生了解理工类学科学术前沿与热点,锻炼其熟练使用各种技术工具与实验设备的能力,丰富未来科学教育课堂的内容和形式,培养出更具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卓越人才。另一方面,试点高校都具有重视学术研究、多学科交叉的优势,能为研究生提供修读跨学科课程、掌握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性平台,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给予学生更多科研课题与学术资源,在科研工作中养成未来中小学科学教师严谨的科研态度与能力,有利于未来科学教育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 3. 提升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学历层次,增进教师综合素养

新时代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要求享受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与当前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缺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作为优质教育的核心要素,优质师资的短缺及配置不均衡等问题日益凸显<sup>[8]</sup>。目前,我国举办师范类专业的院校超过700所,虽然数量众多,但存在办学水平与质量参差不齐问题,中小学教师学科结构和培养层次有待优化。“国优计划”的出台能针对性解决上述困境:①提升教师学历层次,培养一批研究生层次的高水平教师。近年来,通过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培养高学历基础教育教师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教师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出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对高水平高学历教师的需求,世界范围内的教师教育均不断向研究生层次延伸<sup>[9]</sup>。目前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已将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资格证学历水平定为硕士及以上。数据显示,2018年经合组织国家初中教师中具有硕士学历的教师平均占比达45.5%,而至2021年,我国具有硕士学历的初中教师占比仅为4.6%,与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因此,我国在《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中指出要“培养一批硕士层次中小学教师和教育领军人才”,“国优计划”更是明确指出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培育硕士层次的中小学科学教师,提升教师学历层次。②增进教师综合素养,为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与科学教育价值的有效发挥做好师资保障。国家层面之所以反复强调并倡导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参与教师教育,主要原因在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优势和国际国内交流合作密切的学习资源优势,有助于学生实现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培养出具有更丰富的学术经验与创新素养的科学教师,进而更易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同时,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毕业生选择从事教育工作,但是这些毕业生在综合素养尤其是教师职业素养方面存在欠缺,必须接受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以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

#### 4.推动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高质量的教师教育体系是培养高质量教师的基础,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是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与组成部分,有助于弥补师范院校作为教师教育单一主体力量不足的劣势。近年来,国家层面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强调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重要意义,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切实参与教师教育实践,如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2021年,“十四五”规划继续明确要“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2022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再次强调“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然而,系列政策与倡议并未引起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对教师教育的普遍重视,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不足仍是我国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国优计划”的出台,一方面以政策方式直接规定部分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落实建成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试点高校作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中的“排头兵”,其参与教师教育的措施与成效势必会对其他尚未作为试点单位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产生示范作用,以引领更多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积极主动参与教师教育,推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建设。

## 二、“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困境

### 1.动力之困: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内源性动力不足

“国优计划”能否顺利、高效落实,首先取决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参与积极性和内源性动力。在国家政策的制度性安排下,教师教育是否会引起试点高校的足够重视并激发其参与动力是“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面临的首要难题。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并支持高水平高校参与教师教育。然而,仅有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极少数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响应,甚至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部分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出于发展优势学科的考量,采取了裁撤教育学院等措施,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与教师教育的距离进一步拉大。直至“国优计划”这一政策出台,出于政策外力影响,试点高校才陆续着手申报教育硕士学位授权点、培养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高水平师资。以上行为均说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对参与教师教育的内源性动力不足,而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

(1)学术性与师范性的冲突。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发展教师教育的学术性与师范性冲突具体表现在办学定位、学校文化与学科布局三方面。在办学定位上,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几乎均定位为研究型大学,以学术性为根本特征,以追求高深学问为发展目标。这一目标定位决定了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对研究生的培养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然而,教师教育的师范性定位决定了其重视教育教学技能培养的特点,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所追求的高深学问探究相背离。在学校文化上,在研究型办学定位的影响下,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文化理念同样强调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而教师教育则旨在培养职业实践型人才,一定程度上不具备学术精英性特征,不符合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固有的文化取向。在学科布局上,尽管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较为齐全,但其发展重点更多为强调学术研究与创新的基础科学,教师教育因强调师范性而相对忽视学术性的特征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布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教育学作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工作的基础,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中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双

一流”建设名单内非师范类高校中仅有厦门大学是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另外，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更侧重于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鲜少关注教师培养。

(2)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评价是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指挥棒，大学的评价体系多以学术论文与著作发表数、科研项目数及经费等可量化指标为核心，对教学与人才培养等较为复杂且难以量化的指标重视不足，使得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发展导向呈现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特点。与此同时，家长及学生又以高校评价结果来评判高校，并将其作为择校依据，进一步加深了可量化成果的影响力。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为提升评价等级、提高社会声誉、吸引优质生源，集中精力于提升量化指标成绩，而教师教育因其培养效果具有时滞性且难以量化的特点，未被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难以引起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重视。

除此以外，30所试点高校中的6所高水平师范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教师教育办学定位弱化问题。如表1所示，高水平师范大学的办学定位多有“综合性”“研究型”等表述，教师教育的专业性定位并不突出，仅将其作为综合化进程中的特色组成部分，淡化了其培养高水平教师的基本发展理念。

2. 能力之困：非师范类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基础薄弱

“国优计划”要有效落实，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能力是关键。试点高校中除6所高水平师范大学具有良好的教师教育基础外，其他非师范类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存在教师教育基础薄弱的现实问题。

(1)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普遍缺乏教师教育经

验，教育学院在发展定位方面与教师教育存在偏差。尽管大多数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都设有教育学院、教育研究院等机构，但其办学价值理念多强调学术研究而淡化教育实践，学科发展重心也侧重于高等教育与教育管理，与中小学教师教育相去甚远。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明确提出要“培养知行合一的高层次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管理人才”，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旨在建成“高水平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高层次人才培养高地和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流智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强调其“中心工作围绕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展开”。同时，受评价导向影响，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都想尽快提升社会影响力、拓宽办学空间，突破大众对教育学院只培养教师的常识性认知<sup>[10]</sup>，逐步发展为研究教师而非培养教师的科研机构，与“国优计划”所要求的教师教育存在定位偏差。

(2)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师资储备不足，在学科结构和教师专业结构方面与中小学教师教育需求脱节。在“国优计划”首批试点的24所非师范类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中，除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外均培养教育学硕士生，其中有15所高校也培养教育硕士生，但仅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9校有“国优计划”所需的科学教育教师的培养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9所高校尽管有培养科学教师的经验，但师资力量有限，支撑未来每年30个及以上“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培养可能也存在困难。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从学校到教育学院层面均强调科学研究，院内教师也不例外：①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教师主要从事教

表1 高水平师范大学办学定位

学校	办学定位
北京师范大学	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建成世界一流师范大学，其内涵是教师教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若干学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具有研究型、综合性、国际化的显著特征
华东师范大学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以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为办学目标
西南大学	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建成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力争建设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

注：内容来源于学校官网简介及章程。

育研究工作,服务于高等教育层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其工作性质、研究取向和思维方式等与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教师基本分属于两个体系<sup>[1]</sup>,不具备中小学教师培养经验。②囿于学院主要服务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定位,开设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较少,相关师资更是薄弱,现有的教育学研究成果与师资在支撑“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3.合力之困:“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组织机制不健全

“国优计划”要顺利落实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度配合、体系健全的组织机制。关于“国优计划”研究生具体如何培养的问题,政策并未有明确规定,各试点高校具有较大自主权,目前有四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却也分别存在一些困难与挑战:

(1)以教育学院为主要培养单位,仅进行教育硕士生培养的组织形式。如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招收推免生作为教育硕士生进行培养,授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这一组织形式的主要挑战在于培养过程中需要调动多学科的教育资源。①尽管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在“国优计划”实施的相关文件中均表明要立足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平台优势发展教师教育,但部分院校的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并未体现出综合性特征,实际培养过程中如何切实利用综合性平台优势是必须解决的问题。②若在学科专业知识的授课等方面寻求理工类学院的帮助,则面临与理工类学院的协调配合问题,譬如如何调动理工学科导师配合人才培养,如何协调教师调整授课内容与考核标准以设置符合教育硕士生培养标准的学科类课程。

(2)以学科学院为主要培养单位,教育学院配合开设教师教育课程的双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组织形式。如天津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均在理工类学院招生,授予相应学科硕士学位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这一形式的困难在于:①理工类学院和导师对学生参与“国优计划”的支持度不足。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学术性和学术学位标准决定了理工类学院研究生培养的重点为科学研究,而其科学研究又具有长时间连续在实验室进行的特点,为保证本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理工类学院和导师可能较难支持研究生参与教师教育。②就教育学院而言,既要考虑课程设置在时间与内容上同理工类学院的配合,又要考虑在非主导地位下如何管理学生的问题。③就研究生而言,则面临如何在学制规定时间内平衡并顺利完成两个学位项目的挑战。

(3)联合高水平师范大学共同进行“国优计划”双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组织形式,如大连理工大学和吉林大学联合东北师范大学共同培养研究生。关于这一联合培养形式的合作深度与学位授予,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也面临不同的发展困境:①若仅借助高水平师范大学开设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学位由本校授予,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动高水平师范大学为他校学生授课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保证教师教育模块培养质量。②若属于深度合作形式,即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由高水平师范大学授予,如吉林大学“国优计划”工作方案中明确指出“由东北师范大学授予教育硕士学位”,则又面临不同问题:首先,在高校层次有差异的情况下,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考虑如何动员学生参与并申请较低层次高校教育硕士学位的积极性问题;其次,高水平师范大学对非本校学生的管理以及学校间的资金与责任分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4)仅借助校内教育学院或校外高水平师范大学力量开设教师教育课程,最后颁发“国优计划”教育专业结业证书而非授予学位的组织形式,如南京大学“国优计划”研究生二次遴选通知中表示“毕业时可获得‘国优计划’教育专业结业证书”。这一组织形式除涉及如何协调其他学院、学校配合进行“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外,必须面对的挑战是社会认可度与学生参与积极性的问题:①社会可能对未获得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国优计划”研究生质量产生怀疑,且招聘条件中的学位相关规定可能直接将此类研究生拒之门外。②面对未来就业过程中认可度的不确定性,加之较为繁重的学分修读要求,“国优计划”对研究生的吸引力不足,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

总之,当前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在“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方面存在的组织机制不健全问题亟待解决。

4.活力之困：“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模式有待创新

“国优计划”旨在培养具备跨学科素养、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水平科学家型中小学科学教师，且创新性地提出了双硕士学位的培养方式，与传统的教育硕士生培养具有明显差异。这就要求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有针对性地设计培养方案，形成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科学家型教师培养模式。其中可能面临如下挑战：

(1)课程时间安排与内容设计问题。课程是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载体，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面临的首要挑战：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科学地安排课程。“国优计划”政策文件中明确指出，研究生应修读不少于18学分的教育学相关课程，并进行不少于8学分的教育实践，而阅读各试点高校的相关招生政策可以发现，大多数高校并未延长“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学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科学合理地安排所有课程是一大挑战。②理工类学科课程与教师教育相关课程的融合问题。“国优计划”旨在培养优秀中小学科学教师，为中小学科学教育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做出贡献，这对研究生的素质与知识结构的要求不是理工类知识与教育学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两类知识有机融合。对塑造教师的职业素养而言，教育学院的作用不仅是开设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更应针对理科学科教学、科学教育所需的理工类学科特点进行调整，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理科教学能力。③教育学相关课程设置中还存在研究型课程与实践型课程的比重问题。职业性与实践性作为教师职业的重要特征，是“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必须重视的内容。囿于综合性大学原有教育学科的学术性、研究性特征，部分高校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出现了研究类课程过多而与教学实践紧密联系的专业实践类课程过少的问题，亟待培养过程中调整完善。

(2)实践基地设置与教学实践导师聘任问题。教学能力是教育硕士必须具备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稳定充足的实践基地与导师。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由于长期以来远离教师教育，除附属学校外，与其他中小学校的联系并不紧密，缺少可供“国

优计划”研究生进行教学实践的场地与导师。在试点高校“国优计划”已经开始招生且肩负着为后续其他高校做榜样的背景下，试点高校需要考虑如何挖掘数量充足的优质中小学资源并为之达成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与此同时，受中小学本身课程任务与升学压力的影响，如何调动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并将其聘任为“教学实践导师”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三导师制”下导师间的配合与协调问题。目前高水平高校“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暂时形成了四种组织形式，均指出要实施“三导师制”，即“学科导师+教育学导师+教学实践导师”的指导方式，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要重视分属于不同学校、学院、学科的导师间的配合与协调问题，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互嵌交织。尤其要重视教学实践导师的作用发挥，避免因实践导师有自身教学与考核任务需要完成，学生的课业压力大、实习实践热情较低而导致校外实践导师有名无实现象的出现。

总之，如何设计出强调课程安排的合理性与融合性、包含充足的高质量实践基地、发挥“三导师制”优势作用的创新性培养模式，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落实“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挑战。

5.持续力之困：选拔“乐教适教”研究生与培育从教意愿问题亟待重视

“国优计划”是否能有效落地并培养出一批未来真正从事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师，生源质量是关键因素。如若能选拔出真正热爱教育事业，在品德与能力等方面均符合要求的学生，“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将会事半功倍。当前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国优计划”优质生源的选拔与培育面临如下挑战：

(1)对“乐教适教”研究生的甄别与选拔问题。长期以来，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研究生对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意愿较弱。以浙江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为例，其2021年硕士毕业生进入中初等教育单位就业的比例分别仅为2.98%，3.9%和4.73%，说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所培养的硕士生选择中小学教师职业者较少，“乐教”学生数量不足，无疑加大了“国优计划”研究生选拔中的甄别难度。另外，在研究生入学难和就业难的双重背景下，难免会有

部分学生出于升学和就业的功利性考虑选择申请加入“国优计划”，但其是否具备坚定的从教意愿却很难通过一场面试来甄别。在“豆瓣”“小红书”等平台以“国优计划”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见，“有就业保底”“不打算当老师，为了争取强导名额”等回答并不少见，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

(2) 培养过程中培育研究生“乐教适教”观念的问题。受“乐教适教”学生甄别的困难性影响，加之“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并不签订毕业从教协议，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在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的过程中面临的又一挑战是如何培育学生的从教意愿，培养出一批真正愿意从事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优秀教师。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推进“国优计划”的过程中尤其要考虑以何种方式在课堂与实践中学生进行价值渗透，塑造“国优计划”研究生职业发展观，增强研究生对教师职业的认可度，从而培养一批乐教、适教、善教的高水平中小学科学教师。

综上，“乐教适教”研究生的选拔与培育对当前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 三、“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困境的预防路径

面对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内源性动力不足、教师教育基础薄弱、组织机制不健全、培养模式有待创新、“乐教适教”优质生源选拔与从教意愿培育问题等“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所面临的现实与可能困境，国家层面首先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提供更多政策参考与资源支持，适当调整大学评价体系，将教师教育纳入其中，进而调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积极性。具体至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层面，则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预防和引导：

1. 转变价值观念，承担培养基础教育高水平师资的重要使命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身份认同，提升参与教师教育的积极性与内源性动力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高效落实“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基本前提。①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转变对教师教育的传统认知，认识到教师教育兼具学术性与师范性特征。学术性与师范性是教师教育的一体两面，教师教育不仅具有一贯的师范性特征与要求，同样需要强调对学生

学术研究能力的训练与对教学背后复杂逻辑的探究，只有建立于学术性之上的师范性才能更好地顺应新时期教师教育的发展要求。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在“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不断调整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做到学术性与师范性的有机融合与平衡。②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调整发展理念，明确教师教育的重要性及自身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不仅是为中小学培养一批优秀的科学教师，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以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促进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作为集合多项优势学科与教育资源的综合性平台，作为其余各类、各层次大学发展的示范先导，应认识并重视“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意义，积极承担“国优计划”培养任务，将举办研究生层次的教师教育以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作为自身的使命和担当。

2. 调整教育学院定位，组建精良的教师教育师资队伍

教育学院合理的发展定位与充足的教师教育师资是高水平高校“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能力保障。①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积极引导教育学院调整发展定位。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在全校范围内渗透人才培养与中小学教师培养的重要意义，强调改变教育学院相关教师与管理者的认知，积极引导教育学院调整发展定位，将培养中小学教师和培养教育政策研究与管理人才视作同等重要的人才培养取向，避免“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出现“重教育研究、轻教学实践”的错误发展倾向。②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引育一批高水平教师教育师资。优质的教师教育离不开一支融合教育理论、教学实践与学科专业知识的精良师资队伍。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适当增加教师教育专门编制与科研经费，吸引优秀的博士生参与教师教育工作，并从师范大学引进一批具备丰富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夯实教师教育基础；同时对优秀教师教育者实施奖励机制，对教师参与“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教学成果和师德师风等方

面进行综合评价,表彰一批心怀教育理想、躬耕教师培养的优秀教师,进一步带动引领其他教师发展;另外应积极与教育厅(局)合作,在全省(市)范围内挖掘、聘任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担任教育实践导师,弥补自身在中小学教学经验方面的不足。

### 3. 建立协同组织机制,充分发挥“国优计划”各参与主体的作用

高度协同的组织机制是决定“国优计划”各参与主体高效配合的组织保证。就目前“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四种组织形式而言,其面临的共同挑战即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内部不同学院之间、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与高水平师范类院校之间、不同学科的教师之间等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协调配合问题。①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建立教育资源跨院校、跨院系、跨学科共享机制。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内部院系学科间的合作而言,“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应借鉴交叉学科办学思想,建立健全理工类学科专业间及其与教育学专业间等不同学科资源的共享机制,多学科协同开展教师教育。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与高水平师范类高校间的合作而言,高校间首先应共同组建“国优计划”培养委员会以统筹领导两校相关工作。在高水平师范类高校向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提供教师教育资源的同时,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也应适当向高水平师范类高校提供其他学科资源,将师范类高校的教师教育优势与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平台优势充分融合,进一步提升“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质量。②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完善“国优计划”教师管理制度。如何在增加教学与人才培养任务的情况下调动教师参与“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充分发挥教师主体作用,是“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组织机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对参与“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导师实施“双聘制”,为学科导师、教育学导师及教学实践导师参与教师教育提供身份保障;应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并建立激励机制,将指导精力投入、研究生培养成效等纳入导师考核评价体系,并以此作为绩效分配、评优评先与招生名额分配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引导功能,调动导师参与“国优计划”研

究生培养的积极性。

### 4. 创新培养模式,助力实现“国优计划”培养科学家型教师的目标

探索新型的培养模式是“国优计划”对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提出的重要挑战,也是培养高质量“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必要条件。基于“国优计划”培养科学家型教师的目标,“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模式必然有别于传统的教育硕士生培养,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三导师协同育人等特点。具体而言,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从以下几方面出发创新培养模式:①构建兼具多学科性、研究性与实践性的高水平课程体系。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在“国优计划”课程设置上,首先应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与重视科学研究的基本属性,设置学科前沿课程以拓宽研究生科学视野,并在课程中穿插科研任务,锻炼研究生科研创新技能,为其成长为科学家型教师奠定基础。其次还应注意学科专业与教育学专业的有机融合,设置能整合学科学术学位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两个学位项目核心能力的系统性课程体系。同时应重视教师职业的实践性特点,在教育类相关课程的设置中强调与实际教学相关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类课程。②积极与地方政府及中小学达成合作,建立一批优质实践基地。实践性是教师教育的第一属性。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积极与省(市)教育厅(局)、各地教育局及中小学达成合作意向,以“订单式”培养来解决高水平师资来源、合作进行教改项目研究、主动承担教学实践经费等利好中小学的条件为基础,建立一批高质量的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并聘任一批优秀的中小学一线教师担任“教学实践导师”。在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高水平高校一要注意将教学实践穿插于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与相互促进;二要向实践导师强调,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反思性实践能力,让研究生在实习实践的过程中领悟教育内涵、提升教学技能,为未来从事教师职业奠定基础。③协调理工类学科、教育学科与教育实践关系,发挥“三导师制”优势。“三导师制”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关于“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之举,但如何真正发挥其优势依然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面临的重要挑战。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一方面应从课程



体系设置上协调理工类学科内容、教育学科内容与教育实践内容,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现象;另一方面应以专题培训等形式向导师阐明不同类型导师的职责与分工,引导导师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理解并配合其他导师的教学计划,共同实现培养优秀的中小学科学家型教师的目标。

5.建立全过程质量保障体系,促使毕业生乐教、适教、胜教

为推动“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切实发挥“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成效,促使毕业生真正选择中小学教师职业,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与政府相互配合,建成全过程质量保障体系,具体可以分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外部约束与激励机制两方面:①“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应从内部出发,通过健全选拔与退出机制、强化教师职业认同等方式保证培养质量。应健全选拔与退出机制,培养真正具有从教意愿的未来教师。首先,试点高校应健全选拔机制,在招生考核阶段充分考虑教育学院及教学实践基地意见,通过创新面试形式、增加教师教育相关内容测试等方式尽可能全面地考察研究生参与动机及发展潜力,选拔真正“乐教”的研究生。其次应建立退出机制,当前“国优计划”研究生的主要生源为推免生,学生缺乏工作经验及对实际教学工作的认识,可能对未来要从事的教师职业具有错误认知。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可以将教学实践部分前置,引导学生提早在实际教学中检验其职业认同感,允许学生在第一次教学实践结束后重新考虑未来职业选择及是否退出培养,避免因职业认同感缺失而造成的培养质量下滑及教育资源浪费。应加强课程思政,强化研究生从事教师职业的身份认同。“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注重课程思政,发挥教学名师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学习与实践的各个环节进行价值渗透,帮助研究生认识到基础教育对学生个人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强化其教师身份认同,增强其教师伦理责任意识,降低研究生未来职业选择的游离性。②为使“国优计划”毕业生真正投身于中小学教育,外部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应通过提升教师待遇和深化“订单式”培养等激励研究生从事教师工作。首先,应提升教师待遇以强化毕业生从教意愿。薪资是研究生择业

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各级政府及中小学应尽快落实国家关于提升教师待遇的政策意见以强化“国优计划”毕业生的从教意愿。其次,高校与中小学应深化“订单式”培养合作,畅通毕业生就业通道。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征询研究生从教地区意向,探索建立试点高校间的资源共享机制,积极拓展学生意向地区的教学实践基地,了解用人单位实际需求,促进人才培养与基础教育实际需求相适应。应建立诚信约束机制,增强“国优计划”毕业生就业实际与培养目的的契合性。为提升“国优计划”的约束性,促使政策真正有效落实,教育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可以合力建立“国优计划”研究生诚信电子档案,在入学前与研究生签订从教协议,以对毕业后从事其他类型工作者收取违约金等形式降低毕业生选择从事其他工作的意愿,使“国优计划”所培养的高水平师资更多地、真正地参与中小学科学教育实践中。

#### 参考文献

- [1] 刘辉亚,张晓报.综合性大学发展教师教育的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65-171.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1).
- [3] 李录琴,刘义兵,常宝宁.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培养教育硕士的现状分析与推进策略[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5):39-44,57.
- [4] 卢晓中.论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身份认同[J].中国高教研究,2022(8):30-35.
- [5] 原碧霞.决不是让名校“学霸”大材小用!国优计划:让名师培养名师[J].半月谈,2023(16).
- [6] 李安琪,洪明.教师队伍建设的国际趋势——基于2018年OECD《有效的教师政策》报告的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9(10):15-30.
- [7] 曾丽颖,任平,曾本友. STEAM 教师跨学科集成培养策略与螺旋式发展之路[J].电化教育研究,2019(3):42-47.
- [8] 钟秉林.扎根中国大地 推进强师兴国[J].中国高等教育,2018(Z1):1.
- [9] 梅兵,周彬.新时代高水平师范大学的育人使命与教育担当[J].教育研究,2022(4):136-142.
- [10] 包水梅.我国研究型大学中教育学院的创建及其发展研究[J].教育科学,2013(1):39-45.
- [11] 张应强.高水平综合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可能优势及其现实转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11):18-27,59.

(责任编辑 周玉清)